# 论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写实文学的影响

刘东方，丁亚男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科学主义作为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涵，它所倡导的理性、逻辑和实证精神，在中国现代写实文学的发展建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其向着更加真实、客观和丰富的方向发展。科学主义促进了写实文学题材的开拓与深化；推动了现代写实文学创作方法的发展；孰促了白话写实语言的成长和成熟。在当今人文与技术并行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既要认识到科学主义对文学的积极影响，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作用，保持文学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特质，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更为有效的路径，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科学主义；写实文学；创作题材；创作方法；现代白话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2-0092-09

**收稿日期：**2025-01-16

**作者简介：**刘东方（1966-），男，山东海阳人，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丁亚男（2000-），女，山东威海人，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2.014

新文化运动标炳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被陈独秀形象地称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德先生”历来为研究者们重视，文学研究会“文学为人生”的宗旨，左翼文学为底层大众代言，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定位等，都是“德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外延式表达，但关于“赛先生”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却明显没有“德先生”显豁。目前学界中郭颖颐[①]、俞兆平[②]、苏桂宁[③]、朱首献[④]、姜丽清[⑤]等学者虽然已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但这些研究更多是从思想史、学术史、思潮史、文学史观的视域进行，较少涉及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以及相关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如科学主义对中国写实主义文学的影响等。

据统计，“科学”一词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次数比“民主”更多，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所谓科学，通常指具体的知识与可应用的技术。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艺复兴时期，近现代科学产生了重要进展，18世纪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的快速发展。1870年代，科学主义的英文命名——scientism就已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形式科学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冥想和畅想”[⑥]的思维方法形成了有力冲击。其后，笛卡尔以数理逻辑为中心的实证哲学，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现代逻辑和辩证思维标志着科学主义思想的逐步形成。伴随着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科学主义进一步泛化、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信念与原则导向，逐渐确立了科学主义的内涵与外延，[⑦]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对五四新文学而言，“科学主义”主要指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和判断事物的方法论。

①参见[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参见俞兆平：《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命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

③参见苏桂宁：《科学，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资源》，《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④参见朱首献：《科学主义与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

⑤参见姜丽清：《“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五四文学》，《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2期。

⑥[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0-61页。

⑦俞兆平：《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学衡派》，《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上世纪之交的晚清民国现代文学滥觞时期，人们试图将科学主义与中国文学实际相结合，追求科学理性的新文学，反对愚昧腐朽的旧文学，这也成为贯穿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主旋律之一。学者们引进新术语、新概念，如“古典主义”“罗曼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其中，“写实主义”这一文学概念由梁启超引用日文中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而来，经王国维等人的阐发，至“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坛，逐步演化为“现实主义”文学概念[①]，并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本文沿用“写实主义”这一概念，意图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与文学语境，回溯至写实文学发生场域之中，再现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写实文学建构的多重影响。

## 一、科学主义促进写实文学题材的开拓与深化

古代文学题材多以神话传说、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神魔鬼怪、强盗好汉为主，基本遵循“文以载道”的道统。诚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母之口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②]《水浒传》虽然前八十回表现为“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后四十回则又回到“投诚招安”“忠君报国”的“经国之大业”老路上。五四时期，科学主义使得作家们转变创作观念，扩宽写实文学题材，推动了写实文学的深度发展。

1930年代初，周作人在《知堂文集序》中“打开天窗说亮话”，认为自己“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③]鲁迅的书账里也记录着他读过的大量自然科学著作。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以及张资平等从事文学创作时，已有丰富的医学、军事学、经济学的知识储备。赖和终生行医，号称“诗医”……五四作家的学习经历和职业历程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科学知识以及蕴含其中的科学主义的影响。科学主义所强调的客观真实准确的原则，与写实主义文学描绘现实生活真实面貌，切实表现人们生活状态的创作要求高度契合，作家们所具备的“科学主义”思想也使得他们能够更深入地探讨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扩大创作题材范畴，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和创新。针对写实文学究竟应该写什么的问题，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大量文学思潮、流派，如问题小说、乡土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它们都以反映广大人民生活现实为题材，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科学主义影响下写实文学题材首先表现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人的文学”的创作题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从人性解放的要求出发，表现人生的诸多问题，“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④] 认为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合一”的人性，“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⑤]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写实文学的题材选择，表现真实的人性与实现个性解放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原创性概念之一。周作人从“人”的生物学理论出发，认识到正视和理解人性，包括生理性的欲求，也是谋求思想解放的前提，进而他推导出一个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知识的生理性人性框架，通过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想启蒙，使其文学批评呈现出科学主义的思想价值，如对郁达夫的《沉沦》和汪静之的《蕙的风》的评价。当《沉沦》遭受社会非议、新文学面临旧营垒攻击的时候，周作人第一个为郁达夫小说中的“性苦闷”描写作出科学的评析。他指出作者的描写实质上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作品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并“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周作人一再突出并“郑重声明，《沉沦》是

---

①张清民：《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兴起》，《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②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0年，第758页。

③周作人：《知堂文集》，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④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

⑤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

一件艺术的作品”，他不愿“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①] 对于攻击汪静之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的迂腐之论，周作人同样给予反驳，指出“恃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的献丑”而已。[②] 1919 年 1 月，周作人发表《平民文学》，正式提出了建设“平民文学”的主张，深化了“人的文学”的思想。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录普遍的思想与事，以真挚的文体，记录真挚的思想与事实。[③] 这种对真实的人性和平民人生的重视和追求显现了作家对科学主义之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深刻体认。1919 年 10 月，冰心《斯人独憔悴》发表，开创了观照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和小人物生活的写实文学题材的先河。其后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等文研会作家们，以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主义观念为参照，开始了“文学表现人生诸问题”[④] 的题材创作。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年轻的乡土文学作家将描绘农村生活的状况和农民疾苦、以及他们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和抗争作为创作题材，形成了乡土文学的创作流派，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实文学的进一步深化。

其次，作家们将科学主义的理性精神与个体的敏锐感悟相结合，运用写实的题材，揭示现实中人们悲惨的生存状态，以及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使中国现代文学充满启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鲁迅和老舍分别以浙东农民、小知识分子与北平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并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观念；茅盾以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描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剖析了他们的精神彷徨；巴金以个人的生活经历为题材，反映了知识青年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之中的生存困境。此外，通俗小说创作也充溢着科学主义色彩，其中，侦探小说可谓典型。程小青在 1920 年代中期曾指出：“我以为侦探小说的本身是科学的，对于情节的叙述，往往适用演绎和归纳的方法，那就逃不出逻辑的范围。”[⑤] 在他看来，“研究科学，不但为防免笑话，还可以借此增加材料。譬如‘心理时间’和实际时间的差异形成错觉，应用在‘证人’身上，可以成为一篇绝妙的侦探小说”，所以他也十分“注重学识”，要求“对于逻辑、心理、生理化学、数学和实在的侦探科学等，至少也须略窥门径”。[⑥] 可见，侦探小说中的通俗性美感趣味也呈现出了科学精神影响。

再次，左翼文学揭示社会现实、批判社会现实的创作题材也彰显出科学主义影响的痕迹。1930 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提出了忠实生活本象，关注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矛盾，建设革命文学的观念。左翼文学在 1930 年代达到高潮，作家们通过作品揭示了社会黑暗，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普罗大众的剥削和压迫，呼吁社会公正和民主，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诸多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写实文学题材。当然，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也与国际左翼文学理论的影响分不开。1923—1925 年苏俄文艺论战、拉普文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从 1928 年开始的一系列文学论争。此外，后期创造社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其理论资源多来自 1920 年代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福本主义思潮[⑦]。1930 年代，左翼文化阵营中的《太白》杂志大力倡导“科学小品”，也可视为科学主义影响文艺大众化的成功范例。及至 1940 年代的延安文学题材，也体现出科学主义影响下的写实文学的题材特征。延安文学作家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和革命文艺创作实践的经验，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文学思想，使科学主义的内涵更为深刻，创作题材更为丰富。他们的创作深入描写解放区的现实生活，表现农民翻身的喜悦，讴歌党的领导。同时，也揭示了解放区农民身上精神的奴役和创伤，批判官僚作风和封建意识，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剧变中的敏感和矛盾，从而展现了现实生活的曲折和复杂，使得鲁迅

---

①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8 页。

②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晨报副刊》1922 年 11 月 1 日。

③仲密：《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 年第 5 期。

④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 年第 5 卷第 6 期。

⑤程小青：《侦探小说作法之一得》，《小说世界》1925 年第 12 卷第 6 期。

⑥程小青：《侦探小说作法之一得》，《小说世界》1925 年第 12 卷第 6 期。

⑦李跃力：《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

等所开创的忧愤深广的写实主义文学得以继承和发展。总之，正是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写实文学的创作题材从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到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范围越来越宽阔，表现越来越深刻，描写越来越客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创性特征之一。

## 二、科学主义推动现代写实文学创作方法的发展

就创作方法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多关注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特别注重情节线索草蛇灰线式的跌宕起伏、曲折蜿蜒，多采用线性叙述，更多注重人物的外在行为，缺少生动真实的细节描写与心理刻画，创作方法较为单一。五四时期，科学主义的引入使现代作家们开始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科学主义所强调的客观真实的原则，促使现代文学在写实文学的创作方法上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并与古代文学区别开来，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第一，自然主义的精细分析和细节刻画。茅盾在《什么是文学》中明确指出古代文学在写实方法上的弊端与应改进的方向：中国小说的通病在于抛弃真正的人生不去观察不去描写，只知凭空去想象出些人事，新文学的写实主义在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① 关于“怎样创作关于人生问题的作品”，茅盾提出将自然主义的写作方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运用实地观察的工夫和科学的分析”②，这也是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式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茅盾看来，自然主义的写作方法十分适合新文学的书写。因为“实地观察才能使作品写得真切，避免风格雷同的毛病”，科学、客观的分析描写法可以修正中国传统文学叙述平铺直叙的毛病。《幻灭》中的“游行场景”，茅盾运用了典型的自然主义照相机般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到一码头时，江岸上一簇一簇全是旗帜；这些都是等候轮渡的各团民众。江汉关的大钟正报十点三刻。喊口号的声音，江潮般的卷来。海关码头那条路上，已经放了步哨。正对海关，大彩牌楼，二丈多长红布的横额写着斗大的白字。几个泥面的小孩子，钻在人堆里，拾那些抛落在地上的传单。”③ 从中可以看出，茅盾并非像古代文学那样单纯地摹写人物形象和人物行为，而是在自然主义写实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画社会场景，多方取镜，动静结合，给读者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清晨江岸码头的画面感。《子夜》中对十里洋场的浩大场面、股票交易描写细腻真实，众多的场面和人物虽然同时出现，但却能将其描写得井井有条，同时，又将气氛烘托得热烈激昂。叶圣陶评价茅盾是用“文艺家写创作”和“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来写小说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茅盾的小说创作因其深刻的洞察描写及逻辑分析而具备了自然主义写实方法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茅盾的这种创作方法又与胡适的“实验室精神”方法论不同，胡适强调“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治学方法，茅盾的创作因重视生活体验而避免了同质化和程式化，具有个人式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质。曹禺的戏剧创作同样也呈现出科学主义的特质。曹禺在《关于〈蜕变〉二字》中写道，生物界里有一种新陈代谢的现象：多少昆虫（听说有些爬行的多足动物也是如此），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硬狠狠把昔日的老腐的躯壳蜕掉，然后新嫩的生命才逐渐生长。这种现象我们姑且为它杜撰一个名词，叫做“蜕变”。……“自然”这样派定下那不可避免的铁律：只有忍痛蜕掉那一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④ 这是曹禺在民族文化精神积淀的“原野”上，借助科学的知识、生物学的词汇表达的另一种心灵的“日出”。

第二，形式结构的规范。古代文学中也有类似于现实主义文学，甚至写实文学的创作，但它们对形式结构并不讲究，甚至缺乏结构意识，或各自为营，或散漫随意。五四时期，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代写实文

---

①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51页。

②雁冰：《自然主义的论战——复史子芬》，《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5期。

③茅盾：《茅盾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④曹禺：《曹禺戏剧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67页。

学在结构形式方面更为规范，更具理论体系和理性色彩。胡适曾对“短篇小说”的结构形式作出界定，他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①] 对此界定，胡适作了两点诠释，首先，所谓“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便是社会生活，也就是“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的一个“横截面”。[②] 可以代表“这种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方面”。若不是“最精彩”的所在，决不能用一段代表全体，决不能一面代表全形。[③] 其次，所谓“最经济的文学手段”便是“不可增减，不可涂抹，处处恰到好处”。[④] 因此，凡是可以“拉长演作章回小说的短篇”，不是真正的短篇小说；凡“叙事不能畅尽，写情不能饱满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的短篇小说的表现手段。[⑤] 今日看来，胡适的截取“横截面”创作方法可谓是有关现代短篇小说结构的本质性规定，它严格规定了短篇小说结构的时间长度、空间跨度，并以此与写“纵剖面”的长篇小说结构与文言短篇小说结构区分开来。鲁迅十分擅长现代短篇小说创作，其绝妙之处在于，他总能截取日常生活中最能令人震撼的一个瞬间，作为小说所要描写的人或事的“横截面”，将其深入挖掘，从中反思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痼疾。沈从文、汪曾祺等采取了现代小说的时空结构，这种方法将不同人物的行为和个体的情绪感受片段在时空链条上连缀和并置，从而淡化传统小说依靠人物行为推进情节演变的结构方式，实现了现代写实文学结构形式的创新。

第三，精神分析的心理描写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现代作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许多新文学家在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学习精神分析理论，转换创作思路，改变传统写实只写“实”，不涉及人物思想变化和心理流动的传统方法。现代文学家采用客观的心理分析方法，将笔触涉及人物内心，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更为真实的人物，产生了许多以精神分析作为创作方法的作品文本，如鲁迅的《白光》、老舍的《兔》、郁达夫的《迟桂花》、穆时英的《黑牡丹》、施蛰存的《梅雨之夕》等，这些作品都在文中以精细入微的心理刻画塑造了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其中，作为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的施蛰存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梅雨之夕》通过描绘主人公“我”在下雨的傍晚与一位美丽女子的一次奇遇，展现了都市人细腻隐秘的心理世界，其对人物潜意识的描写，展现了“本我”欲望萌动与“超我”道德约束之间的冲突，以及“自我”在两者之间的彷徨冲撞的“意识流”。精神分析创作方法的引入使现代作家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的描写，更加细致入微地描绘社会生活，从而使作品中人物的刻画更加深厚，情感内蕴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为真实可信。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现代写实文学创作方法的精细度不断加强，心理描写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结构形式日趋规范……现代作家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创作“科学”的文学，为现代写实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并使之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

## 三、科学主义敦促白话写实语言成长和成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现代语言学开始萌蘖并影响渐隆，语言哲学界与文学界开启了“语言本体论转向”的“航程”。人们由关注世界的本体，转向关注人的认知方式，进而关注语言，并将语言推崇到本体的地位，譬如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都呈现出以语言为中心的强烈诉求。语言本体论认为，人生活在语言之中，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的重要媒介。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语言是存在

①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 年第 4 卷第 5 期。

②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 年第 4 卷第 5 期。

③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 年第 4 卷第 5 期。

④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 年第 4 卷第 5 期。

⑤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 年第 4 卷第 5 期。

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用词语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①] 该理论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人们开始反思“语言工具论”的不足和弊端，将语言视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中心，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强调语言符号系统的及物性，特别强调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索绪尔把语言比喻成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②]。也就是说，当人们要表达某种思想时，不可能在不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却又能非常明晰完整地将其内容传达出来。萨丕尔认为：“几乎在语言表达开始的时候，思维过程像是一种精神泛滥，就渗进来了；并且，一个概念一经确定，必然会影响到它的语言符号的生命，促进语言的进一步成长”。[③] 他们明确的认识到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与思想密不可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胡适、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汪曾祺等都具有较为明确的语言本体论思想，[④]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白话语言相伴相生、相互成就、相互成长，而与现代写实文学相对应的白话写实语言无疑是现代白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成熟也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

首先，科学主义强调实证与理性，这一原则与写实文学不谋而合，并促使人们在写实文学的创作中更加注重现代白话语言的精确性。我们知道，古代文言擅长写意，具有典雅蕴藉的特点，有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魅力，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文言也存在“表达模糊不清，描写不甚精确，内容多重理解”的缺陷。与此不同，现代白话语言，特别是现代白话写实语言，在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的影响下，注重表达的精确性、准确性，力求用客观写实的语言传达和表现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形成了现代白话写实语言的话语方式，使现代白话语言得以长足发展。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小说语言既具有个人特色，也具写实性特点。老舍是旗人，也是地道的“老北京”，同时，他又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五年，可谓具有海外学习的经历，这不但让老舍站在了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系中，也使其拥有了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在学习西方语言表达技巧的基础之上，老舍融合中国民族的白话语言，形成了准确、简约、俗白的现代写实语言风格。“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饰，从现成话里掏东西。”[⑤] 他从字词的使用入手，“制造”现代白话语言的写实美。他主张用现代的字，不用生僻的字，老舍的作品大都用字量不大，一般掌握二千左右汉字的人就能读懂，但其表达的含义却十分准确，能产生一种精确简洁之美。[⑥] 此外，老舍特色的“京味”语言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一道亮眼风景。老舍用充满了京味儿的白话语言描绘作为创作背景的老北平，又以其生动质朴的白话语言，精准地勾勒出底层人民艰辛挣扎的生活状态和命运浮沉，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增强了现代文学白话语言的精准度。《骆驼祥子》中写祥子的外表，“那么结实硬棒，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托。”场景的准确摹写有《断魂枪》中孙老者练武场景的描绘，心理描写如《月牙儿》中关于“我”的心理状态叙述，这些都是极好的例证。老舍的语言虽明白如话，却描写精准，叙述到位，表达真实，乍看平淡无奇，却浅中有深，平中有奇，于平易处见工夫，显示出现代写实语言的魅力。老舍作为现代白话的代表作家，其简洁准确写实的话语方式，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现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

其次，科学主义使得现代白话语言与古代文言和白话相较更具真实性。鲁迅认为古代文学是“瞒和骗”

---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58页。

②[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8页。

③[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页。

④参见刘东方：《全球化语境下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现代语言学意义上周作人的现代白话语言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文学语言观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以胡适和老舍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从胡适、傅斯年到鲁迅——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的变迁》，《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意译”与“直译”——以林纾和鲁迅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3期。

⑤老舍：《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76页。

⑥刘东方、宋益乔：《文学语言观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以胡适和老舍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的文学，往往以大团圆作为结局，很少有真实表现社会现状和普通人生活的作品。譬如，部分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回避现实社会的问题和矛盾，不直接反映社会现状和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而是倾向于描写理想化或超脱现实的情景，如神话传说、才子佳人等，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真实，也削弱了作品的批判现实功能。同时，部分古代文学作品常常被用来宣扬和维护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有时甚至对现实进行美化或曲解，这样的作品表现的是上层社会的思想诉求和审美趣味，属于典型的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于此相对应，古代文学语言，特别是文言文，往往追求华丽和修饰，使用大量的典故，文言话语又具有写意的优势，适宜表现上层文人情趣，符合他们的审美需求，这不但使得古代文言作品晦涩难懂，更使得这种话语方式难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思想和现代情绪”。因为，根据语言本体论思想，语言与思想具有同向一致性，思想与语言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思想情感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反之，有什么样的语言也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周作人就认为：“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字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缘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就随处出现。”① 周作人虽然没有接触西方现代语言学，但他凭借自己的感悟已经认识到一种语言只能适配与之相对应的一种思想，古代文言体系尽管典雅写意，但它根本不能真实地表达现代人思想和现代社会的现实，而古代白话虽然与文言不同，但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又存在贫乏干枯，随意性强，难以规范，表现力弱的缺陷。因此，无论是古代文言，还是白话，都缺乏真实表现现代社会，直面现代人生的功能。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古代文学缺乏写实性和真实性，难以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和描写，缺少表现社会、反映社会、批判现实的作用和价值，既为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和接受，限制了古代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更难以与现代写实文学揭示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现实的要求相吻合和匹配。而科学主义所强调的求真精神，写实文学要求真实细致反映社会真实状况的创作要求，与“惟求不失真”的现代白话不谋而合，并在现代写实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强化和发展。作家们致力于通过细致的观察和记录，用现代白话描写现代生活的本来面貌，揭示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表现时代风貌，展示现代社会中现代人，尤其是普通人和“小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现代作家们通过对小知识分子、农民、农村妇女、城市贫民等实际生活的实地考察，创作出一大批具有高度真实性和社会价值的作品。正是在此视域内，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代写实文学，不但打破中国古代文学的局限，用具有真实性特征的现代白话表现现代社会，反映社会现实，彰显现代思想，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了现代白话的成熟和发展。

再次，科学主义使现代白话语言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具体表现为现代语法、句法的规范性应用。“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大多都受到科学主义逻辑精神的影响，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白话的现状和实际，将欧化语法元素融合于现代白话的表达之中，为现代文学语言带来了许多新的元素，敦促现代白话直至现代汉语的发展和成熟。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老舍等人都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又为有名的翻译家，阅读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著作和现代语言学知识。他们均认识到传统白话与文言表达不严密，逻辑性不强的问题，而这又与文言与传统白话的语法和句法简单有关。因此，现代作家们在各自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中，在从句的使用，虚词、关联词的使用，倒装句、被字句的使用等方面不断完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和丰富性。其一表现为从句使用的增加。现代白话增加了诸如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等附加句子成分，以便于精细的描述和周密的表达思想和情感，不再像传统文学那样留出空白让读者去意会、去猜测、去想象……定语从句用于修饰名词或代词，能让描述更加细腻，更加准确；状语从句则用

① 周作人：《思想革命》，《周作人作品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年，第 23 页。

于修饰动词、形容词或整个句子，提供时间、地点、原因、条件等背景信息，这些从句的引入使现代白话语言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修饰更加详细，能使句子包含更多的信息，增加表达的层次性和逻辑关系，减少了歧义性和模糊性，极大增强了现代白话语言的逻辑性。其二，关联词的大量运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如非必要一般都会省略掉句子中的关联词语，而现代白话中则大量使用表示转折、假设、让步、因果的关联词，关联词语的使用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普遍语法现象。上述关联词语的使用，准确表现了词语和句子的语法关系，表达了语句的丰富内涵，增添了语句的逻辑标识，因而增加了语言的逻辑性。譬如鲁迅《祝福》："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① 上文中一系列的关联词，巧妙地表达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复杂的情感变化。"大约"这个词表示推测或不完全确定，表现了主人公对祥林嫂内心状态的猜测。"因为……感到……"则是因果关系的关联词；"然而"表示转折，引导出主人公对前一个推测的怀疑，暗示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会不会"表示不确定性，主人公在思考是否有其他未被察觉的原因。"或者是"则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表明主人公在探索除了当前推测之外的其他潜在原因。"倘有……则……"是一个假设关系，表明如果存在其他意思，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但随后"表示转折，主人公随后改变了想法，对自己的过度推测感到好笑。通过这些关联词的使用，鲁迅展现了主人公在对祥林嫂的同情与自身责任感之间摇摆不定的心境，以及最终对自己过度推测的自嘲。繁杂的情绪变化，依靠关联词语的指引，使现代白话语言表现得逻辑清晰，富有层次，也为文本内容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变化的内在逻辑轨迹。可以说，关联词语的使用不仅是文学语言上逻辑的呈现方式，更是思维过程的呈现方式。

正如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文学的语言，乃至文学的形式，绝不是文学内容的"附属物"，语言绝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和形式的问题，不同的语言形式必定会承载不同的思想内容，若要实施"五四"文学革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就必须实现语言符号由古代文言到现代白话的革命性转换，进而实现中国文学由古代思想体系向现代化思想体系的转型。科学主义为现代白话语言的写实性表达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其具有准确性、真实性与逻辑性特征，不但促使其发展和成熟，也为现代写实文学提供了有力支撑。

## 结语

科学主义，作为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国现代写实文学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科学主义所倡导的理性、逻辑和实证精神，为现代写实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创作理念，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学界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还远远不够，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往往被边缘化，缺乏深入的论证阐述和实证分析。在当今人文与技术并行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研究更应拓宽视野，重新审视和考量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一方面，应认识到科学主义对文学的积极影响，理解其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科学主义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产生过度程式化、客观化和机械化的影响，保持文学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特质。当下，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发展对文学的解构趋势。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曾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他认为"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因特网，在塑造人们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

①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①] 2000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抛出“文学死了”的惊人论断。他的演讲后被译为中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发表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今天，伴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2022年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年”，全新的科技生产方式正对传统的文学产生着“颠覆性”的影响。微软小冰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这本诗集是首部人工智能创作的受版权保护作品。该诗集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关于科学与人文、智能写作与作家主体性等关系的论争和热议，“应当在人本位的传统价值导向上顺应时代潮流，走出隐形的象牙塔，在‘古镜新磨’中寻求新旧的平衡点，兴利除弊，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文学写作”。[②] 总之，我们应在当下的大背景下深入思考科学主义与文学之关系，消弭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对立，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以期达到二者的和谐共生，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视野，提供更为有效的路径，开创更为宏大的空间，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我们盯着后视镜看现在，倒退着走向未来。”[③]

##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cientism on Modern Chinese Realistic Literature

LIU Dong-fang, DING Ya-n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ationality, logic and empirical spirit advocated by it has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alistic literature, and promoted it to develop towards a more real, objective and rich direction. Specifically, scientism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realistic literary theme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alistic literature creation methods, and urges the growth and maturity of vernacular realistic language. In today's background of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we should not only realiz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scientism on literature, but also avoi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xcessive stylization, mechanization, and keep the humanistic care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eliminat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more effective path and open up a broader space for the present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 scientism; realistic literature; creative themes; creative methods; Modern vernacular

[责任编辑　唐音]

①[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刘东方、王佳昕：《科技与人文共舞——人工智能文学写作初探》，《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10期。

③[加]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页。